

《三国典略》考

李玉峰

(仰恩大学, 福建 泉州 362014)

摘要:《三国典略》,唐初时人丘悦著,现已亡佚。本文广泛查考有关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献,对此书作者的生平、撰写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等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以书目记载为基础,通过全面分析佚文的内容,对此书的体例、特点、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作一综合研究。

关键词:《三国典略》;丘悦;后三国史学派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7)01-0055-06

唐人丘悦所撰《三国典略》是历史上流传较久、影响较大,而今已亡佚的一部重要史书。最近瞿安全先生撰写专文,对这部佚书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考证^①,可见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瞿文的考证尚有未周,本文拟在其基础上作点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凡瞿文论述较为详密者,本文尽量从简叙述,而考证重点放在其有所疏忽之处。文中如有不当,敬请瞿先生以及关心南北朝史和唐代史学史的同行人予以指正。

一、作者丘悦仕履考

丘悦的仕履,史传有简略记载。瞿文亦已作过考证,但所引史料有阙,分析更欠深入,兹作补充考证。

丘悦,河南陆浑(今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人。字号、生卒年均不详。其可考的最早仕履,是任汾州司户参军。宋代书目著录《三国典略》一书,俱题为“唐汾州司户参军丘悦撰”(详见下文)。汾州在唐代为上州,而上州司户参军的官阶是从第七品下。此前丘悦必定有过一段为官经历,惜不可考。但丘悦任汾州司户参军,在他一生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主要著作《三国典略》,大概就是作于这一时期。因为他的这一历官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宋人应该是根据其成书时的署衔加以著录。否则,他在此以后的仕履明见于史传,宋人不会视而不见。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丘悦已担任弘文馆直学士。《新唐书》卷一一二《员半千传》记载:“(员半千)稍与丘悦、王勳、石抱忠同为弘文馆直学士。”

员半千在其出使吐蕃为武则天所留后不久,被任命为弘文馆直学士,与丘悦、王勳、石抱忠等成为弘文馆同僚。《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中·员半千传》更明确记载了员半千被任命为弘文馆直学士的时间:

“证圣元年,半千为左卫长史,与凤阁舍人王处知、天官侍郎石抱忠,并为弘文馆直学士。”《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武德后,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已下曰直学士”。由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知道,至迟在证圣元年(695)丘悦已由地方进入了中央,由从第七品下阶的汾州司户参军升迁为六品以下的弘文馆直学士。他能担任这一官职,大概当时已经以“亦有学业”著名于世,或许与他在汾州司户参军任上著《三国典略》一书有直接的关系。

丘悦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是在李旦(即唐睿宗)相王府任职。丘悦入相王府的时间,《旧唐书·员半千传》附传说是中宗景龙(707—710)中,其实是错误的。《升仙太子碑》碑阴题记云:“大周神龙二年(706)八月相旦奉制刊碑刻石为记”,所列从官有:“朝议大夫行安国相府记室参军事丘悦、朝议郎行安国相府文学韦利器”等^②。这证明他入相王府至少要比史传所记载的早一年。《旧唐书·员半千传》又称丘悦入相王府所任官职是“府掾”、“王府直学士”,这里的“府掾”大概不是指具体官名,而“王府直学士”之称仅见于此,似乎也不是正式官名。我们怀疑所谓“王府直学士”,是指以“王府”属官的身份担任弘文馆“直学士”。如史载王义方“俄授晋王府参

① 瞿安全:《〈三国典略〉略考》,《文献》2002年7月第3期。

收稿日期:2006-03-18

作者简介:李玉峰(1977—),男,河南省沈丘县人,助教,福建仰恩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历史文献。

② (清)王昶撰:《金石萃编》卷六三,光绪癸巳(十九年)仲夏上海醉六堂印。

军，直弘文馆”^①。按照唐代官制，王府记室参军事为从第六品上阶，王府掾属为正第六品上阶，朝议大夫为正五品下阶文散官。如果说丘悦从第七品下阶的汾州司户参军直接进入相王府，最初任记室参军事，兼弘文馆直学士，其后加授正五品下阶文散官，也不无可能。如此，则丘悦入相王府当在证圣元年以前，比史传所载中宗景龙中要早十多年。

丘悦还担任过太子左谕德、昭文馆学士。《旧唐书》卷三一《音乐志四》：“皇帝行用《太和·黄钟宫》，左谕德、昭文馆学士邱悦撰。”“邱悦”即“丘悦”^②，《全唐诗》卷一四《郊庙歌辞》据此收录其诗，即题云：“左谕德、昭文馆学士丘悦作。”太子左、右谕德皆为正第四品下阶，必为丘悦出相王府后所担任的官职。不过他出相王府只是由于李旦复皇帝位，自然就没有相王府了，别无他故。他由相王府转为李隆基当太子时的东宫府官，可以说仍然颇受重用。又据《唐会要》卷六四《史馆下·弘文馆》记载：“神龙元年（705）十月十九日，改为昭文馆，避孝敬讳故也。二年，又改为修文馆……（景云）二年（711）三月八日，复改为昭文馆”。丘悦神龙二年尚在相王府，他担任昭文馆学士显然不可能是神龙元年，而必定在景云二年三月以后。

不久，丘悦又被加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兼宋王侍读、上柱国，与修《一切道经音义》。《全唐文》卷九二三史崇《妙门由起序》，列举与修诸臣名衔甚为详备，内有“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谕德、昭文馆学士、兼宋王侍读、上柱国臣邱悦”，“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昭文馆学士、柱国臣韦利器”等^③。史崇，《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朝野僉载》卷五皆作史崇玄，附太平公主，为太清观主。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太平败，崇玄伏诛。这篇序文大约作于睿宗太极元年（712）。这里又一次提到韦利器，说明他与丘悦关系之密切。银青光禄大夫已是三品官，上柱国则为正第二品勋官。

开元初，丘悦仍为银青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金石续编》卷六《韦利器等造像铭》，《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二《秘书少监韦利器等弥陀赞》，二者实为一文，俱题“银青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邱悦赞，……大唐开元三年（715）岁次乙卯八月十日小子利涉书。”史传称丘悦“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当在开元三年以后。岐王即杜甫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的岐王李范。据《旧唐书》卷八《玄宗纪》记载，李范卒于开元十三年（725）夏四月。那么丘悦就应当卒于

开元三年至十三年间。

丘悦的著述，除了《三国典略》一书外，《新唐书·艺文志》还著录有《丘悦集》十卷^④，亦已亡佚。所存仅有上文提到的史志所收《太和》乐章一首，《全唐诗》改题作《仪坤庙乐章》^⑤；以及《金石续编》所收《韦利器等造像铭》一文，《八琼室金石补正》题作《秘书少监韦利器等弥陀赞》，《全唐文》题作《石佛铭》^⑥，《唐文续拾》题作《大弥陀等身像赞》^⑦。此外，丘悦还与修过《一切道经音义》。

二、写作的背景

瞿文最大的疏略，是只就本书作考论，而未能将其放在唐代学术大背景下来作讨论。我们通过考察当时史书编撰的情况，发现武则天至唐玄宗时可能有一个后三国史学派，颇堪重视，而瞿文无一言及之，兹略发其微。

众所周知，唐初确立了史馆修史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了唐代私人修史活动的开展。官方史学主要是修撰前朝正史、唐朝国史和实录，其中中国史、实录的修撰由史馆垄断，个人不得私撰。天宝年间，广文馆博士郑虔就曾私修国史，为人所告，“由是贬谪十余年”^⑧。对于前朝正史的修撰，官方倒是没有禁令，但朝廷既已组织人力编写了，即使有某些缺陷，如以个人之力再加重写，也很难有多大突破，因为史料在官，私人很难见到，人物臧否又不能不与官史基本保持一致，无法成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私人修史被迫避实就虚，向别的方面发展^⑨。

官修诸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也有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都是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唐初的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由隋入唐的李大师就“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⑩。

一方面，官修“正史”取得“独尊”的地位，用纪传体这种形式逐朝逐代进行修史完全被官府垄断，国史的撰录更非私修所能问津；另一方面，“正史”

① 《旧唐书》卷一八七《忠义上》，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② 《金石续编》卷六《韦利器等造像铭》有银青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丘悦。《八琼室金石补正》三二《秘书少监韦利器等弥陀赞》：题银青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邱悦赞。

③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923，中华书局 1983 年 11 月版，第 10 册，第 9622、9623 页。

④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第 6 册，第 2076 页。

⑤ （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九四，中华书局 196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19 页。

⑥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六二，中华书局 1983 年 11 月版。

⑦ 《全唐文》附陆心源撰：《唐文续拾》卷三，中华书局 1983 年 11 月版，第 11 册，第 11205 页。

⑧ （宋）王谠《唐语林》卷三《文学》。

⑨ 详参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第一章《唐代官方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7-8 页。

⑩ 《北史》卷一〇〇《序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 10 册，第 3343 页。

也存在着其体裁所决定的缺点。在这样的情形下，唐代的私人修史适应着社会要前进，史学要发展的需要，走出一条颇具影响的道路，展示着中唐以后中国史学演变的趋势。这就是：编年史和杂史大兴，通史风骤起。丘悦以西魏北周、东魏北齐、梁陈三国“编年而为之”，撰《三国典略》三十卷，正是这一史学风气影响下的产物。

丘悦《三国典略》一书所叙内容主要是南北朝后期梁、陈先后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分鼎峙的“后三国”历史。关于“后三国”这一说法需要在这里详加说明一下。《周书》卷一六《赵贵等传》云：“史臣曰：‘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可见唐初修《周书》等正史时已有梁、陈与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分之说。《续高僧传》卷九《隋京师大兴善道场释僧粲传》^①：“释僧粲，姓孙氏。汴州陈留人也。幼年尚道游学为务，河北江南东西关陇触地皆履，靡不通经。故涉历三国备齐陈周。诸有法肆无有虚践。工难问善博寻。调逸古今风徽遐迹。自号为三国论师。”《续高僧传》称齐、陈、周为三国，《宋高僧传》无此称，可见此称唐代前期较为流行，宋代以后知之者鲜。直至清代，王鸣盛才再次提及这一说法，他在《十七史商榷》卷66《天下再三分》条中对上文《周书》中“史臣曰”加以发挥，说：“梁中大通六年（534年）魏别东西，天下三分，至陈太建九年（577年）周灭齐，为南北。“愚谓陈、齐、周亦亚魏、蜀、吴。”“后三国”这一说法今天却甚少为学界所知，一些学者在引用《三国典略》中的史料时往往单凭书名就误认为是东汉、三国之时。例如，黄今言、陈晓明和王凯旋等学者都在自己的论文^②中引用过《太平御览》卷八三八引《三国典略》的一条史料：

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尝为门客所说，举钱营生，广收大麦，载赴晋阳，候其寒食，以求高价。清明之日，其车方达，又从晋阳载化生向邺城，路逢大雨，并化为泥。息利既少，乃至贫迫。当世人士，莫不笑之。

李岳，《北史》卷四三《李崇传附李谐》^③中有所记载：

谐长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纯至，居期惨，未曾听婢过前；追思二亲，言则流涕。

《北史》只简单提及其官名及孝行，但据该传上下文可知，李岳主要生活在北齐时期。但上述学者都误把李岳作为东汉时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书名中冠

以“三国”的史书，形成了研究“后三国”的一个热潮。除了丘悦的《三国典略》，还有：员半千《三国春秋》二十卷，何彦先《三国战策》十二卷，崔良佐《三国春秋》卷亡，宗谏《三国采要》六卷等。这些书也和《三国典略》一样都已佚失，下面分别对其作一简单的介绍和考察。

员半千《三国春秋》，二十卷。关于此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大唐新语》卷四：“员半千，……撰《三国春秋》二十卷，行于代。”《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传上·王义方传》亦有记载，同书《经籍志》却不见收录。《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员半千《三国春秋》二十卷”。根据以上三书的记载，作者员半千，本名余庆，字荣期，齐州全节（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半千生而孤，为从父鞠爱，通书史。客晋州，州举童子，房玄龄异之。长与何彦先师事王义方，义方嘉重之，尝谓之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唐高宗上元（674-676）初，应六科举，授武陟尉。后又应岳牧举，深受高宗赏识，擢为上第。垂拱（685-688）中累补左卫胄曹，充宣慰吐蕃使，引辞时为武后留用。证圣元年（695），为左卫长史，与丘悦、王勣、石抱忠等同为弘文馆直学士。撰《明堂新礼》三卷，上之。则天封中岳，半千又撰《封禅四坛碑》十二首以进，则天称善。长安（701-704）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左迁水部郎中，预修《三教珠英》。中宗时，为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征拜太子右谕德，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开元初卒。员半千还著有《临戎孝经》二卷，《员半千集》十卷。

何彦先《三国战策》，十二卷。此书未见唐宋书目著录，张固也先生《新唐书艺文志补》中予以著录。《册府元龟》卷五五六曰：“何彦先为地官侍郎，撰《三国战策》十二卷，行于代。”《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曰：员半千“少与齐州人何彦先同师事学士王义方。及义方卒，半千与彦先皆制服，丧毕而去。”《新唐书》卷一一二《王义方传》曰：义方“既死，门人半千、何彦先行丧，蒔松柏冢侧，三年乃去。彦先，齐州全节人。武后时，位天官侍郎。”由这些记载可知，何彦先与上文提到的员半千是同一时期的人，二人曾同师王义方。《大唐新语》卷二亦略载其事。

崔良佐《三国春秋》，卷亡。《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著录该书。崔良佐又附见于《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下·崔元翰传》。通过这两条记载，我们知道他是深州安平（今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人，是唐睿宗、玄宗时大臣崔日用的侄子（一说为从昆弟）。约于玄宗开元年间擢明经甲科，补湖城主簿，以母丧，遂不仕。隐居于共北白鹿山（在卫州汲郡共城县，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之阳。生卒年不详，

① 《续高僧传》，（唐）释道宣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影印宋碛砂大藏经》本。

② 参见黄今言、陈晓明《汉代贩运贸易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01期；王凯旋《两汉官僚商人之比较研究》，《学术交流》1999年01期。

③ 《北史》卷四三《李崇传附李谐》，第4册，第1604页。

门人谥曰贞文孝父。

宗谏《三国采要》，六卷。该书为《宋志》史抄类著录，两《唐书》未见著录。关于作者宗谏未见史书记载其事迹，仅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载其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可知其为唐时人。

员半千等人关于“三国”的史书，都早已失传。《玉海》卷四一《艺文》“续春秋”条著录员半千和崔良佐的两部《三国春秋》，《宋志》著录宗谏《三国采要》，都把它们列入汉魏和晋代史书之间，盖以为诸书皆记载魏、蜀、吴三国事。既然丘悦《三国典略》明明是记载后三国史的，尚且有不少人将其误为前三国，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认为这些史书应当都是记载后三国历史的，理由有三。第一，上述作者中，丘悦与员半千同时作过弘文馆直学士，而且二人还同修过书^①，又都卒于开元初。而员半千与何彦先又曾同师事于王义方。他们三个人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崔良佐的生活年代比三人略晚，但前后相接，仍有可能相互认识，有着思想和学术上的交流。既然丘悦之书所谓“三国”是指后三国，那么同一时期的另三书也应相同。第二，以上四人都是武则天至玄宗时人，当时距离“后三国”时代比较接近，这是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时间上的原因。这一时期学者还撰写过很多书名中虽无“三国”字样，但实为记载这一段历史的书籍，史传和书目中常见记载。史家重视近现代史书之编撰，本不足为奇。第三，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和长安，正好是“后三国”激烈鏖战之处，这是他们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空間上的原因。第四，宗谏生平爵里无考，但宋人曾用其《十三代史目》校补《魏书》^②，可见《史目》后魏部分之价值。其《三国采要》也应是有关后三国的史书。

总之，由于唐代史馆垄断了前朝断代纪传体史书和国史的编撰，私人修史偏重于向编年体、杂史、通史发展。而由于后三国时代距离唐朝较近，加上同时并存着多个政权，断代纪传体史书相互重复和隔越的现象尤为严重。于是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出现许多用编年或杂史的体裁综合叙述这一段历史的史书，形成一个“后三国史学派”。丘悦《三国典略》正是其代表作品。

三、《三国典略》的史料来源

① 见（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二三史崇《妙门由起序》，列举与修《一切道经音义》诸臣名衔甚为详备，内有“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谕德、昭文馆学士、兼宋王侍读、上柱国臣邱悦”，“银青光禄大夫、崇文馆学士、上柱国、平凉县开国子臣员半千”等。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第10册，第9622、9623页。

② 参见《魏书》卷五三《李孝伯 李冲传》校勘记（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四册，第1191页；《魏书》卷八六《孝感传》校勘记（一），第五册，第1887页。

关于《三国典略》的史料来源，瞿文未专列为一个问题，仅简单提及其某些记载或许直接采自正史，对于其他史料来源则未有提及，兹作补充考证。

《三国典略》的成书在唐代官修的南北朝的几部正史之后，观《三国典略》现存之佚文，大都见于正史，而且有不少佚文叙事与正史相同，只有些微字词的差异。南北朝的几部正史是《三国典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史料来源大概是无可置疑的。

除了南北朝的几部正史外，《三国典略》应该还广泛参阅了其他一些关于“后三国”时期的书籍，比如《颜氏家训》。

《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三国典略》云：

魏收尝在议曹，与诸博士（此处原有“引据《汉书》”四字，当为涉下文衍）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韦玄成传》，抵（掷）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寻，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颜氏家训》^③卷第三叙此曰：

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比较二者所叙，人物、情节完全相同，唯《三国典略》更精简一些，可以有很大的把握说它改编自《颜氏家训》。

对《三国典略》以南北朝诸正史和《颜氏家训》等作其史料来源，还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北齐书》卷四五《文苑·刘逖传》^④：

刘逖，字子长，少而聪敏，好弋猎骑射，发愤自励，专精读书。……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

《颜氏家训》卷第四：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而《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三国典略》云：

刘逖字子长，少好弋猎骑射，发愤读书，颇工诗咏。行台尚书席毗尝嘲之曰：“君辈辞藻，譬若春荣，须臾之玩，非宏材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雕悴。”逖报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荣，何如也？”毗笑曰：“可矣！”席毗嘲刘逖之事《北齐书》未载，《颜氏家训》

③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北京直隶书局抱经堂原刻本。

④ 《北齐书》卷四五《文苑·刘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册，第615页。

又未见“刘遯子子长，好戈猎骑射”等的记叙。显然《三国典略》综合了二者所叙。

《三国典略》还有一些条文未见之于上述诸书，例如：《太平御览》卷二五九引《三国典略》王庆籍条和卷二六三引《三国典略》崔龙子条。再如《太平御览》卷一五六所引《三国典略》记载梁元帝君臣是否还都健康的讨论中召卜者杜景豪决其去留一事也不见于上述诸书。显然《三国典略》还有别的史料来源，个中情形，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三国典略》的著录、流传及体例

关于《三国典略》的著录和征引情况，瞿先生已作了比较仔细的考察，但也有几点需要加以补充。

在此书的著录上，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成书的《崇文总目》卷三《编年类》著录该书：“……今篇第多遗，自二十一以下卷阙。”^①《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丘悦《三国典略》三十卷”。《新唐书》的编撰约始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嘉祐五年（1060）最后成书。其编撰晚于《崇文总目》，所记《三国典略》卷帙却为三十卷，这种情况瞿先生认为有两种可能性：1、《新唐书》沿袭《旧唐书》丘悦本传的说法；2、当时或许还存在《三国典略》的足本。不过从《新唐书·艺文志》史料来源上的特点来看，它本来就是杂取各种书目史传而成，^②此书当亦属于第一种情况。此后各种书目著录的《三国典略》再无完本，只存二十卷本，可以作为旁证。

《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二亦著录该书^③。

明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从》卷十三《乙部·史部占毕》和《诗薮·杂编》卷三《遗佚下·三国》中亦提到唐丘悦《三国典略》。^④可见当时全书已佚。

关于此书的征引，瞿文提及最早征引此书的是《初学记》^⑤，该书卷29异文校6页“乌龙赤虎”条引《三国典略》曰：

齐高纬以伏斯狗为赤虎。

该条出于宋本异文，但是否徐坚书原文尚不敢断定。因同书卷30异文校11页“化蚕蛻”条引及五代《（后）汉实录》和唐末的《岭表录异》，知宋本存在由后人窜入的情况。《初学记》是唐玄宗开元时编

纂的大型类书，如果上文所引《三国典略》真是徐坚书原文的话，则可见丘悦《三国典略》一书在当时的影响。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许逸民先生《初学记索引》第201页将《三国典略》与鱼豢《典略》混为一书，应予纠正。

宋吴淑《事类赋注》^⑥书中多引《三国典略》，大多同《太平御览》，然有两条不见《太平御览》，吴氏曾预撰御览，很有可能他见到过《三国典略》的原书。

宋陈旸《乐书》^⑦，孙逢吉《职官分纪》^⑧、祝穆《古今事文类聚》^⑨等书亦有摘录。大多同于《太平御览》，大概都是转引自《太平御览》。

《说郭三种》^⑩之宛委山堂本（一百二十卷）卷五十九收《三国典略》二十条，十六条与《太平御览》同，杂有三国时孙权、甘宁之事两条，另有两条为《御览》所未见。《说郭三种》之另两种却不见收录《三国典略》，很可能《三国典略》是宛委山堂本的整理者后来扩充进去的^⑪。

明胡我琨《钱通》卷二一和洪遵《泉志》也各引了一条《三国典略》佚文，为他书所不见。

清吴宝芝撰《花木鸟兽集类》收录《三国典略》三条，皆见于《太平御览》所引，且与之基本相同，可能是转抄自后者。

至于该书的体例问题，瞿文经过考证认为《三国典略》是一部不太成熟的、具有杂史特征的编年体史书，以西魏、北周为正统，纪年以西魏、北周为准。然诸书所存之《三国典略》佚文却大多未有年月系之，这很可能是这些类书在征引《三国典略》时省掉了在其看来不必要的年号日期。

除此之外，该书在体例上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1、运用追叙手法，往往先叙述人物的重要事迹，再追叙其往事。如《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三国典略》祖珽条。2、叙述西魏、东魏时期的事情时，往往分别直接冠以北周、北齐之名。如《太平御览》卷三三二引《三国典略》“周王思政固守颍川”条。

《三国典略》的体例是比较简单的，这甚便于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时直接取资。

五、《三国典略》的史料价值

①（宋）王尧臣等撰：《崇文总目》卷二《编年类》，清咸丰间南海任氏刻本。

②张固也：《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吉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又：《也论新唐书艺文志》，《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③（北宋）陈骙等：《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二，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合刊铅印本。

④（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光绪二十二年季春二月广雅书局校刊本。

⑤（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九《严陆校宋本异文》校6页，中华书局，第三册。

⑥《事类赋注》，（宋）吴淑撰，中华书局，1989年12月。

⑦《乐书》，（宋）陈旸撰，四库本。

⑧《职官分纪》（宋）孙逢吉，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⑨《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宋）祝穆，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1989年7月。

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⑪参见陈先行：《〈说郭〉再考证》，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和郑春颖：《重编〈说郭〉辑佚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

⑫《钱通》（明）胡我琨，四库本。

⑬《花木鸟兽集类》，清吴宝芝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关于《三国典略》的史料价值,瞿先生在其文中十分详细的考证了其可以用来补充正史和校勘正史的两个方面。但还有两个方面可以加以补充:

1、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大量引用了《三国典略》。

《三国典略》见之于《资治通鉴考异》者共111条,自梁中大通六年(534)魏主伐高欢始,至陈天嘉四年(563)周与突厥木杆可汗连兵伐齐事止。《崇文总目》谓《三国典略》起西魏而终后周,而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但观《资治通鉴考异》所引,起于西魏诚然,却未终于后周,可见司马光所据《三国典略》可能已是残本,和《崇文总目》所说篇第多遗,自二十一一下卷阙正合。

《三国典略》为《资治通鉴考异》所引证的111条条中,有35条为《资治通鉴考异》所从之,更有25条是有别于正史而作为独家证据为《资治通鉴》所采用的。例如《资治通鉴考异》卷七:

东魏军士逃奔魏者,告以高欢所在。(《周书·贺拔胜传》云:太祖见齐神武旗鼓识之。今从典略。)

又如梁元帝焚书一事,《资治通鉴考异》亦明言采用《三国典略》:

帝焚图书十四万卷(隋经籍志云:焚七万卷。南史云:十余万卷。按:周僧辩所送建康书已八万卷,并江陵旧书岂止七万卷乎?今从典略。)

还有一些《资治通鉴》采用了《三国典略》却未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提及的情况,例如瞿先生在其文中考证的《资治通鉴》采用《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三国典略》佚文关于梁元帝时是否还都建康的讨论的记载。

2、《三国典略》佚文中也有很多关于方术迷信的记载,其中的一些对后世的现实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太平御览》卷七三四《三国典略》云:

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莲茎化为人面,着鲜卑帽。妻昼寢,寢寢云,见人长一丈,遍体黑毛,欲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

该文所叙“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就在北方的一些地方产生了影响。例如晚清时的河北定州地区的《乐亭县志》称五道庙“村村有之”,并以为即五圣祠,“北方所祀则皆云为土地、山神、苗神、龙王、增福诸神,或减其二为三圣,又或增为七圣九圣。至五道之称,乃《三国典略》所谓五道将军入宅不祥者……斯亦流俗相传愈传愈诞者矣。”

我们都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民谚,“九头鸟”最早就见于《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后因张居正而与湖北人联系在一起。

①《辞海》(修订本)“九头鸟”条说:

亦名“苍鷖”,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后演化为迷信故事……。

《辞源》(修订本)“九头鸟”条说:

传说中的妖鸟。《太平御览》九二七《鬼车》引《三国典略》谓九头鸟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后世以九头鸟比喻奸诈狡猾的人。……

《三国典略》现存佚文,虽以政治、经济为主^②,但也有一些涉及文学、科技的史料,为当今的一些学者应用于文学史、科技史的研究^③。

主要参考文献:

- [1] (宋)李昉等著.《太平御览》[M].中华书局1960.
- [2] 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等编.《太平御览引得》[M].燕京大学图书馆,(北平海淀)引得校印所印,1935.
- [3]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中华书局,1961年9月.
- [4] 王秀梅、王泓冰编.《太平广记索引》[M].中华书局,1996.
- [5]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M].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宗青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 [6] 瞿安全.《〈三国典略〉略考》[J].《文献》2002年7月,3.
- [7] 张固也.《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J].《吉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 [8] 张固也.《也论〈新唐书艺文志〉》[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1期.

(下转第45页)

- ① 可参见王桂华:《“九头鸟”琐谈》,《党史天地》1996年08期.
- ② 今人将《三国典略》所存史料应用于政治、经济史研究的,可参见张旭华、王海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02期;朱和平:《魏晋南北朝长途贩运贸易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03期.张泽咸:《略论汉魏南北朝时期海河平原农牧业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02期.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
- ③ 参见萧华荣、汪春泓等:《〈诗品〉研究五种荟评》,《文学遗产》1996年03期;徐青:《南北朝诗人对诗律的探索和贡献》,《湖州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年01期;王发国、陈晓超:《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上)——兼论陈延杰〈诗品注〉》,《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01期;陈庆元、林怡:《齐梁佚诗存目考(中)》,《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03期;云国霞、陈尧:《〈钟嵘诗品集释〉述评》,《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06期.林琳:《我国古代的机器人》,《文史杂志》1999年02期.

- [5] [清]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6] 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燕京学报》第14期;此据《古史辨》七册(下)节录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7] [汉]王充撰.论衡[M].上海:上海书店,1986.
- [8]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9] [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 [10]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1] 俞伟超著.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一—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1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4] [北齐]魏收撰.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5]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6] [宋]朱熹撰、陈立校点.论语集注[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7] [清]俞正燮撰、涂小马、蔡建康、陈松泉校点.癸巳类稿[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18]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 [19] 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联书店,1996.
- [20] 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 [21] 李修松.立社与分封.安徽大学学报[J].1992,2.
- [22] [清]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卷2《武王伐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3] 杨鸿年著.汉魏制度丛考[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 [24] 吴泽.两周时期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J].1986,4.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Aigongwensheyuzaiwo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DU Zheng-q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For the recordation of Aigongwensheyuzaiwo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ll the while, scholars disputed for wenshe or wenzhu. By textual analysis, the author point that wenshe should be wenzhu, in this place, zhu should be shezhu or not miaozhu. when Lu ai-gong ask zaiwo what is shezhu, zaiwo answer that song-bai-li are used in three dynasties. Combined historical context, the paper think that Lu Ai-gong should understand decorum about shezhu, his true purpose is to resolve political hidden trouble of Sanhuan by wenshe.

Key words: Analects of Confucius; Aigong; Zaiwo; Shezhu

(责任编辑: 石磊)

(上接 60 页)

A Research on *San Guo Dian Lue* LI Yu-feng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14, China)

Abstract: *San Guo Dian Lue* (《三国典略》) was written by Qiuyue who liv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of which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had already lost. Its content records a “latter three kingdoms” era when Liang, followed by Chen of the Southern & Northern Dynasty faced off the Eastern Wei Dynasties, followed by the Northern Qi as well as the Western Wei, followed by the Northern Zhou. And using the years of the Western Wei and the Northern Zhou narrates every year. The representation takes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as the core. Include some Fangshu (方术) as literature as well. Few specializations had made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 so comes this essay aims to make a comparatively detailed textual criticism from the author's lif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write, its record and spread situation, style, characteristic, respect, source of historical data and value, etc..

Key words: *San Guo Dian Lue*; Qiuyue; A school of “latter three kingdoms” era

(责任编辑: 黄云鹤)